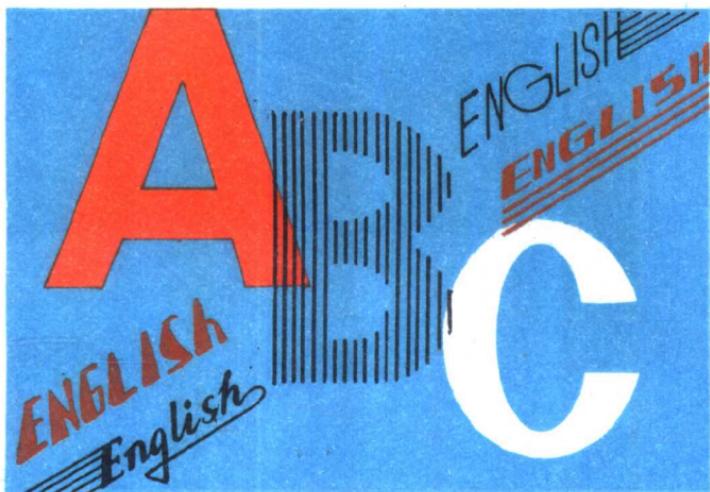


北京教育丛书



中小学英语教学改革探索

● 方碧辉

● 光明日报出版社

北京教育丛书

中小学英语教学改革探索

方 碧 辉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小学英语教学改革探索

方碧辉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5印张 100千字

1989年9月第一版

1989年9月第一次印刷

1—10000册

定价：2.00元

ISBN7—80014—537—9

G·143

北京教育丛书

周谷城著

《北京教育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问：李晨 韩作黎

主编：徐惟诚

副主编：姚幼钧 杨玉民 张鸿顺 温寒江 白耀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洪波	王平	王光裕	王洪权	王桂生
王家骏	王碧霖	白耀	叶钟玮	汤世雄
杨玉民	张鸿顺	陈清泉	陈境孔	吴懋株
林慈	范小韵	罗玉圃	贺水葵	赵正中
姚幼钧	胡红星	钟善基	徐仁声	徐惟诚
阎立钦	曹福海	梁慧霞	温寒江	

序

徐惟诚

教育事业的重要，已经日益被愈来愈多的人认识了。

中国要振兴，归根到底要靠我们中国人自己努力奋斗，要靠我们的全体劳动者创造出数十倍于今日的劳动生产率。这是一个全体国民素质提高的过程。人们自然要寄希望于教育。

要搞好教育，需要做许多事情，其中最根本的还是要靠人、靠教师，尤其是担负着国民基础教育任务的中小学教师。

教师的重担，关系着祖国未来的命运，也关系着每一个教育对象未来的命运。他们所教的学生在未来的社会条件下，究竟怎样做人，怎样立身处世，能不能用自己的双手为社会做出贡献，从而也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在青少年时代所受到的教育。

我们知道，人，是世上已知物质发展的最高形态。关于人的意识、观念、智力的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我们离知道得很清楚还有很大的距离。社会主义的教育科学需要有一个大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

在教书育人第一线工作的广大中小学教师，对社会主义

教育科学的发展应当有特殊的贡献。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把一辈子的心血都用来为祖国培育后代、造就人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理当成为整个教育战线的共同财富。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件总结和传播经验的工作过去做得还很不够。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拨出专款，指定专人组成编委会，编辑出版一套《北京教育丛书》。这个决定受到广大中小幼教师的欢迎和支持。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已经报来几百部书稿。又有一批热心而有经验的同志担任编审工作，看来任务是可以完成的。

我们相信，《北京教育丛书》的编辑出版，对于鼓励广大教师钻研业务，积累经验，对于传播和交流这些经验，对于推动教育科学研究，对于提高普通教育的水平，都是有积极作用的。同时，这套丛书的出版，也将有助于人们认识教师所作的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

改革和建设的大潮在祖国大地上汹涌澎湃，每天都有许多新问题提到我们面前来，也把许多新问题提到我们的教育工作者面前。这是一个需要有许多新创造的时代。教育战线上的同志们为祖国的振兴所建立的功绩，是不会被人们忘记的。

目 录

第一章 在崎岖的小路上攀登

- 一、我国外语教学走过的道路 (1)
- 二、新的历史时期为外语教学提出了新任务 (5)
- 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外语教学的落后面貌 (6)

第二章 探索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规律 (10)

- 一、从儿童学母语的过程中受到的启示 (10)
- 二、“看、听、说”——让幼儿开始学一点外语
..... (14)
- 三、对普通教育中英语教学规律的一些探索 (21)

第三章 开辟一条外语教学的新路 (45)

- 一、一部教学大纲(草案)，几点新的突破 (45)
- 二、课本是授课之本 (72)
- 三、教法必须得法 (89)

第四章 我是怎样教课的 (98)

- 一、功夫下在课外 (99)
- 二、千方百计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103)
- 三、按部就班地进行语音教学 (107)
- 四、结合学习及记忆方法进行词汇教学 (113)
- 五、配合启发思维进行语法教学 (118)
- 六、一课书的具体实施 (123)

第一章 在崎岖的小路上攀登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探索一条中国学生学习外语的科学途径。为了总结过去，也为了对比今天，我们不妨对我国的外语教学作一简单的回顾。

一、我国外语教学走过的道路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具有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无论从国内各民族间的文化交融，还是从与域外各国的友好交往来看，都曾经产生过语言上的沟通问题。当时掌握了两种语言、能够担任“通译”或“通事”的人，大都是曾经生活在民族混杂和国境线附近的人。象唐朝著名诗人李白，据考证就出生在现中亚的巴尔喀什湖以西，因此才会有《李太白醉草吓蛮书》的传奇故事。如果不将历代高僧为了研读佛经而学习梵文计算在内的话，真正以培养翻译人员为目的进行教学的，恐怕要以一八六二年清末在北京成立的“京师同文馆”为最早了。^①这所学校附属于“总

^①1834年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富的夫人 (Mrs. Gutzlaff) 在澳门开办了一所教会学校，设有英语课，原只招女生，翌年始收男生，遂有六名中国人入学，这是中国人在校学外语的最早记载。

理各国事务衙门”，说来算是一所国立学校。从语种上看，先后开设过英文、法文、俄文、德文、日文就当时的条件而论，总算是多语种了。这所学校还兼有译印数、理、化、文、史等书籍的任务，也可以说是“学以致用”吧。不过开始只收八旗子弟，后来虽收汉族学生，恐怕也很讲究门第，可见这时的外语教学纯属贵族教学的圈子。

同文馆既开先例，随着“洋务运动”的鼓噪和“戊戌变法”时“废科举、兴学堂”主张的推行，洋学堂取代了私塾，在大城市的中等学校里，也逐渐地开设了外语课。^①在租界中由外国人为自己的子女开设的学校中也吸收个别的中国学生，这样的学校当然从小学入学开始就要学习外语，对外国儿童是母语，而且其它课程也用外语教授。另外，还有由外国教会创办的学校，也是从小学就学外语，除去“国文”及中国历史、地理外，其它课程使用的也是外文教材。这两类学校可说是我国最早从小学开设外语的。

我们的国家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而数千年封建制度形成的保守传统又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因此，我们在考察解放前的外语教学时，必须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才能分析当时的教学目的、教学思想、教学方法等一系列问题。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认教会学校担负着文化渗透的任

^①据1898年的不完全统计，各省学堂开设外语的有17所；1902年底京师大学堂设立“译学馆”，则是我国高等院校外语专业教育的起点。同年还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成了新式教育的法规。

务，而能够进这类学校的多数学生也未尝不想将来出国留洋或在国内的洋行中谋个差事。外语既然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工具，也就成了得天独厚的一门主课。一方面，老师使劲地灌，学生拼命地学；另一方面，其它课程由于使用外国教材，甚至用外语讲授，实际上成了外语的复习和实践。外语课虽然采用直接听说教学法，但到了高年级还要辅以文法、阅读等课程。这样从小学到中学十二年下来，其水平不难想象。如果他们再升入燕京大学这类外国人办的高等学府，继续学下去，到大学毕业时，外语真可以运用自如了。

如果把这种情况视作“崇外”的例子，我们不能忽略中国人还会有“排外”甚至“敌外”的另一面。由于身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多数中国人，其中也包括身居社会上层的中国人，有一种朴素的排外、仇洋情绪。而在遭受侵略、沦为亡国奴时，这种情绪就会进而发展成民族意识。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占区，日本人在中、小学中强制推行日语教学。由于同学们的普遍抵制，连日本教师的专制体罚手段也无济于事。这或许最清楚不过地说明，当学习上缺乏动力甚至有抵触情绪时，是不会收到预期的学习效果的。

解放以后的中小学外语又是一种情况。五十年代初，举国上下一心学习苏联，走“老大哥”的道路，于是外语教学也出现了“一边倒”，在大学和中学普遍开设了俄语课。当时的学校固然远比现在为少，但国家经济的底子也远比现在薄得多。开设一门新课，需要相当的师资和经费，在各级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一方面原有的英语教师改教俄语，一方面从社会上招收了失业的知识分子充实教师队伍。就当时我国的俄语水平而论——无论从俄语人才的数量还是质量上看，

恐怕要比现在的英语水平为低。但老师们晚上在“中苏友协”学，白天在学校教。两三年之后，一支可用的俄语教师队伍就形成了。而同学们由于学习积极性高，成绩也还不坏。由于俄语和英语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都有不同的规律，课堂教学上由语法翻译法取代了直接听说法。这一影响是长期的。六十年代外语教学“转向”，大部分学校又由俄语改为英语，俄语教师也改教英语，但语法法教学却没有改变，至今在不少学校仍占统治地位。

十年动乱中，中学的正常教学秩序完全被打乱了。文化上的虚无主义和政治上的极“左”路线，极大地干扰了外语教学。当时有的教材中出现了“面包”这样的生活词汇，居然有人认为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对此，周恩来同志中肯地指出：如果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工人提出“要面包”的口号，那“面包”这个单词算不算政治词汇？

正是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过问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放英语讲座。随着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全国出现了“英语热”。

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我们的外语教学结构上出现了“倒三角”的现象，具体地说，儿童是学语言（包括外语）的黄金时代，但我们的小学却不开设外语。在中学，新开科目和并行课很多，外语才挤进来进行“启蒙”教育，结果一些学生负担过重，顾此失彼，只好放弃必修课。升入大学的同学，不得不从A B C开始学外语，尽管多数同学通过了考试，但一扔就忘。只有在参加工作之后，由于实际需要或应付职称考试，才进入各种补习班或拼命自学来迎头赶上。

近年来，这种“倒三角”现象虽有所改变，但距离从根本

本上改变我国外语教学的落后面貌还相去甚远。

二、新的历史时期为外语教学提出了新任务

目前，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中央提出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改革方针。这是完全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英明决策。无数的历史经验教训表明：闭关自守不利于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成功的管理经验。而要扩大交流、引进国外的先进的东西，没有外语这一交际工具是不成的。按照中央的部署，沿海城市要首先对外开放。随着一系列经济措施的贯彻落实和旅游事业的发展兴旺，各开放城市普遍感到普及外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作为担负普教任务的中小学，如何改进外语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也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了。

大家都知道，经济是一个国家的今天，科技是明天，教育则是后天。我们要大搞改革、振兴中华，就必须重视教育事业。我国教育上的十年空白给各行各业带来的人才间断，已经暴露出了严重后果，从反面为我们敲起了警钟。

为此，邓小平同志专门为我们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的主要内涵是要求我们一方面要从明、后天的中国和世界来培养未来的人才，另一方面则要使今天的教育必须与国际的先进水平同步。

但是，我国目前的教育还十分落后，纵向地说，比起解放前虽有较大发展（尤其在普及方面），但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横向地说，在全世界150多个国家中，我

们也仍是下游。这样的现状，不能不令人忧心忡忡。

具体到中小学的外语教学，问题尤为突出。大、中、小学开设外语课的情况不能尽如人意，已如前述。其结果，便是已经具有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即已经在大学通过外语考试及格的人实际上达不到能够独立翻阅外文资料的水平。即使是研究生毕业，阅读外文比较顺利的，听说能力也谈不到，远远无法进行学术交流。至于获得高级职称的科技人员，他们的外语水平也无法与他们的科研成就相比。

我们这里还只涉及外语的课程设置及由此必然造成的事倍功半的结果，作为引子；下面再在相应的章节中具体讨论教材与教法的情况。

总之，无论是整体的教育，还是具体的外语教学，现状都相当落后，不能适应“四化”大业的要求。我们作为外语教师，应当站在外语教改的最前线。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我们只有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来。

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外语教学的落后面貌

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外语教学的落后面貌呢？

首先从学制上，要从小学低年级起即开设外语，并对小学、初中、高中直至大学和研究生院的外语课程进行统筹安排，在阶段性中加强连贯性。

许多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实验证明，儿童在四岁至八岁时，对语言最敏感，是学习语言的黄金时期。如果大家注意观察儿童学习母语的变化，就会发现这一结论是正确的。我自己多年教学实践同样证明，凡是从小学开始学习外语

的，语音和拼读这两道难关解决较好，听说能力和习惯容易培养，语感也较便于建立。

儿童的模仿力强、记忆力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如果我们把成年人业余补习外语所花费的时间前移到小学阶段，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把开设外语课的时间提前到小学低年级，即使不考虑其它有利条件，单以学时计算，就完全可以在小学完成现在初中阶段的教学任务，在初中完成现在高中阶段的教学任务，在高中完成现在大学公共外语的教学任务，达到外语基本过关的水平。依此类推，大学毕业生的外语水平就可以与现在的研究生的外语水平相当，走上工作岗位后，就够用了。这样外语和专业知识就可以同步，对学习和工作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从教材上，要有一整套完整系统的课本。课本是授课之本，不同的教材反映了不同的教学思想和教学目的，并且客观上制约了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其中包含着对语言和教学科学的认识，是一定要重视的。

目前我们使用的外语教材，我认为有几个问题。第一，小学、中学和大学一概从头学起。这样一来，学得好的学生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炒冷饭”，而学习困难的学生也只能一次次地吃“夹生饭”，既妨碍了前者的积极性，也影响了后者的稳步提高。第二，教材单一化。一方面由于统考指挥棒的影响和其它种种限制，任课教师别无选择。另一方面自学外语的成年人也往往满足不了各自带有针对性的具体要求。第三，国内自编教材趋于老化，而引进的教材又不是遵照中国学生学习外语的规律编写的。凡此种种，自然都不利于达到理想的学习效果。

如果我们的外语教材能和语文、数学教材一样，从小学到大学统一起来，而且在基础阶段之后有多种针对性的课本，对学生（在校的和成人自学的）不是大有裨益吗？

再次从教法上，也应该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外语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这和语言作为基本交际工具这一特点是密切相关的。然而我们目前的外语教学一是围着课本转圈子，除去一些老师和同学的个别安排外，既没有课外阅读（泛读），也没有课外活动；二是从阅读到阅读，忽视了听、说、读、写、译的语言能力的综合发展，以致小时只知背单词，大了只懂抠语法，无法用作交际工具。

如果我们能够从小学开设外语，就可以充分发挥儿童活泼好动的特点，把外语课上成有一定情景和语言环境的生动的实践课，从小建立起良好的听说习惯和能力，培养起正确的语感，以后随着年龄和思维的发展，逐渐把感性知识上升到理性知识，并在牢固的知识基础上锻炼出学习外语的能力。这样的学生即使走出校门，仍能依靠已有的知识和能力，不断提高，才能称得上是“外语过关”。

这样的设想是非常必要的。假如能够实现的话，就可能按照九年义务教育的要求，在全国普及初等中学教育，外语课能够在初中毕业时达到目前高中毕业水平。这样，全国不仅不再有文盲，也没有了外语盲。在这样普及的基础上的提高，当然是高水平的。

这样的设想是可能实现的。除去师资要作调整和补充外，其余的问题都可以在教育系统内部解决，毋需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兴师动众。

在小学开设外语课，我已试验了二十多年，效果是肯定的。

的。培养人才的周期很长，我们国家又这么大，如果从现在抓起，按大、中、小城市及农村的顺序，从有条件的地方先办起来，真正能在全国收效，恐怕也要进入下一个世纪了。反之，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抓，真不知这种不平衡和拖后腿的现象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解决。

目前有一种倾向，一谈在小学开外语，就提出要录音甚至录相等电化教学设备，似乎没有这些现代化的教具，就无法开课。实际上，这么多年来，我们依靠师生自己动手，利用简单的“土”教具，还不是同样完成了教学任务？

至于师资，也可以吸取五十年代培养俄语教师的经验，在现有教师中加以培养，或是从社会上适当招聘，即使是边学边教，也可以雪中送炭，暂解燃眉之急。